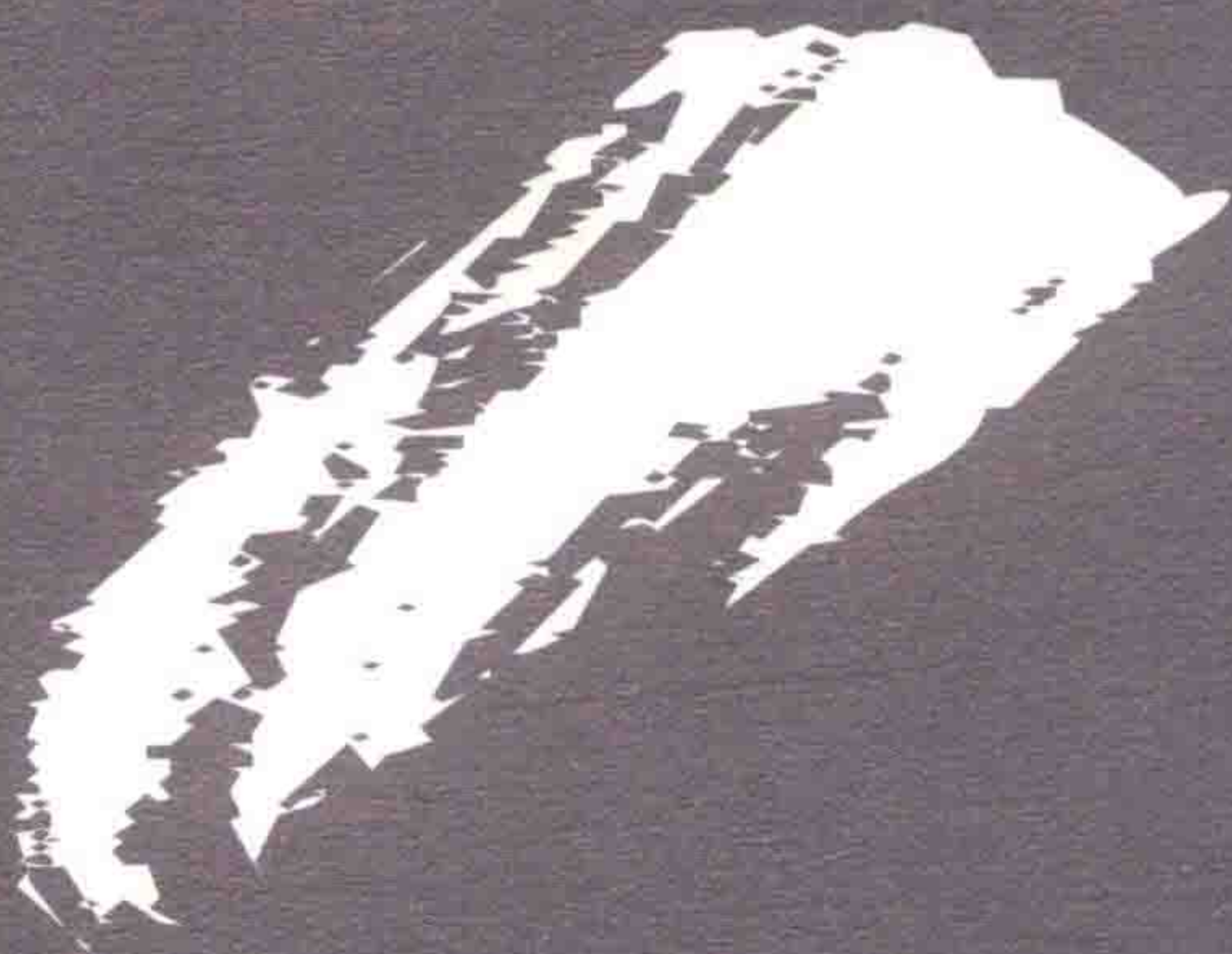


天边有一块乌云

儒学与存在主义

刘东 著



当孔子与萨特相遇
当儒学与存在主义对话

刘东教授深思三十年
潜回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
厘清中国文化的本质
挑战通行的传统解释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天边有一块乌云

——儒学与存在主义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边有一块乌云:儒学与存在主义/刘东著. —
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8. 4
(梧桐书丛)
ISBN 978-7-214-21582-6

I. ①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儒学—研究 IV.
①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1112 号

书 名 天边有一块乌云——儒学与存在主义

著 者	刘 东
责任编辑	陆 扬
责任校对	洪 扬
装帧设计	王 超
责任监制	王列丹
出版发行	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	15.375 插页 4
字 数	28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21582-6
定 价	58.00 元(精装)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到清华园来复建这个一度辉煌过的国学院，原本觉得最“不怎么像”的，就要数自己主持的这个“王国维纪念讲座”了。——人家王先生是什么性格？那简直是“望尽天下不幸”啊，而最终也就用他的“想不开”，去验证了他生命中的确实“不幸”。可我呢，却镇日里都是乐呵呵的，就连埋头写完了一天的作，站起来伸一个大懒腰，哼着唱着想去找点儿甚么吃的，坐在我隔壁的博士后们，也会情不自禁地议论上一句：“快乐教授啊！”

然而，风月宝鉴的另一面却是：打从早年的那本处女作《西方的丑学》、到自己已在北大和清华都讲过一遍、又刚刚交付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《悲剧的文化解析》，再到眼下摊开在面前的这本新作，我却往往表现出了相反的精神取向，总是盯紧了人生最可怕、最负面、最黑暗、最无常的东西，且还是别人

最想闪避、最不愿谈的东西。——或者在自己的潜意识里，我是先要琢磨透了这些，先把它从心理上给克服了，先在论述中把它给降服了，才能有心劲儿再去做别的事情，才觉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了。

紧赶慢赶地做出来的这项研究，总标题为《先秦理性主义的遗产》，它将由三个内在相连、循序扩张的部分组成。而排在最前的这本《天边有一块乌云——儒学与存在主义》，作为整套“三部曲”的上册，则先是要在（无神论）存在主义的反衬下，潜回到创化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中去。——借助于由此而建起的可比性，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能够清晰地看到，尽管其结论和终局都大相径庭，然则却唯有萨特哲学或加缪文学的那个现代起点，反而才最为类似先秦儒者面临的思想困境。

的确，也许有点儿出乎意料的是，一旦这种看似“古老”的儒学，被带入了现代学术的对比语境中，它立马就拂去了后世蒙上的种种尘埃，显出了其跨越时空的超前性质。——在由此打开的、更加宽阔的比较视野中，人们甚至可以醍醐灌顶地发现，孔子当年那些使人如坐春风的教诲，竟是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；而且，无论这种现世主义学说的天穹，看上去如何明亮、光洁、晴朗、蔚蓝，可在它对于人生的理解边界上，仍自潜伏着一块看似不太起眼的乌云，——那幽深的暗斑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，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，代表着天命的莫测与残酷。

而且,只要是忠实于孔子的未遭磨平的言说,而撇开后世的诸多混淆、强解与掺和,我们接着还会豁然开朗地继续意识到,只有在充分警觉人生脆弱性的基础上,才有资格来谈论儒学的悦乐精神,也才能真正领略到所谓“夫子与点”的精义。——也正因为这样,我在本书中就既带挑战性、又带尝试性地提出,跟那般讲滥了的凡俗之见不同,实际上,既清醒地意识到了“绝地天通”,又坚定地憧憬着“天人合一”,并去谋求双方之见的相互支援、激发和限定,才完整地筑就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底色。

上述前提又决定了,孔子在预埋了这种心理苦痛的同时,也就为“轴心时代”之后的文明历程,预留了接受严峻挑战的心理空间。惟其如此,至少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,如果“悦乐精神”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,那么“忧患意识”就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底线。——正因为有了前者,才使这个高度发展的古老文化,升华成了世界性的灿烂文化;又正因为有了后者,才使这个文明的顽强气运,艰难地赓续至今而绵绵不绝。

从这种思想判断出发,我便对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行解释,也都沿着论述的展开而进行了独出机杼的新解,以规避以往笼罩在“中国哲学”中的那种“比较的风险”,并增进中国与当今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。比如,本书提出了“绝地天通”的起点,以平衡以往的“天人合一”之说;又提出了“认识优先”的原则,以修正以往的“伦理本位”之说;还提出了“儒杨互

补”的命题，以替代以往的“儒道互补”之说；更以“内在而不超越”的否定判断，拒绝了以西格中的“内在超越”之说……

紧接着此书的那本中册，眼下暂且定名为《论儒杨互补》；而排在这套“三部曲”之末的下册，则暂且定名为《孔子思想的西方回声》。抱歉的是，尽管也早就写出了它们的初稿，并且多次分别进行过相关的讲演，但我在这里还是不便详细地对之分说，宁可保留一点儿阅读的悬念。唯独可在这里稍加申说的，只是它们要共同隶属于“先秦理性主义”的范畴。——在我看来，也只有这一个、而非任何其他范畴，才属于儒家“人生解决方案”的基准与渊藪。也正因为如此看重，我才会依次从内核、外围和域外三个层面，结合着各种历史记载、人生经验和学术评论，来综合考察这种作为理性的价值系统。——事实上，如果中国文明还想对世界文明做出什么贡献，也只有指望这种既清醒、又自制的理性主义精神了。

还有，应在这里预作坦承的是，即使已经打算这么“兵分三路”了，我还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个人的限制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些篇幅终究有限的著作中，却要既体验着对于生命大限的自省，又基于大规模的古今思想串讲，和广角度的中外文化对比，去针对源自先秦的儒家与杨朱，以及它们延伸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丰富意义，乃至在域外传播中的镜像反映，来落实和发挥自己的学术直觉，并努力提出“拨乱反正”的见解，这对于一个生命有限的作者来说，几乎就构成了不可能“完满完

成”的任务。正因为这样,自己早在发笔之初便已经清醒意识到,最怕的只是没有收到建设性的商榷,而不是听到了哪怕很激烈的批评。

不过,也正因为这是在“自我作古”,有一条就可以请大家放心,那就是无论自己运思得是对是错,它总归是由我本人“异想天开”的,也就是说,它们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的毛病,就是不会去明知故犯、或欲盖弥彰地“借用”别人。只是话说回来,还是出于这种“文责自负”理由,越是进入了“后期写作”的生命阶段,我就越是想要来征引自己。而且,似乎越是到了晚近的这个阶段,这种并不符合“学界常规”的积习,也就越是难以对之进行遏制。——其中主要的原因无非是,许多绞尽脑汁的学术话题,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触过了的,我都不会再轻易地予以放过,总会把该主题悄悄地发展下去,直到那些看似无关的思想线头,能够从各个方向被收拢过来,连接成疏而不漏的一整张网络。既然如此,一旦碰到自己克服过的话题,我也索性就“好话不说两遍”了,以免雷同于那些没出息的做法:倒是没见某些人怎么去抄袭别人,却总见他们在无聊地拷贝自己。

学术生涯毕竟是很宝贵、也很短暂的,能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很长,而自己积累的话题又如此广泛,绝不能那样去虚掷和浪费!所以,即使只从消极的角度来讲,这样做也是在暗地在希望,这种特殊的、同本人昔日作品之间的互文性,至少也

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,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过几十年的、活生生地喘息过的生命历程;更不要说,再从积极的角度来讲,这样做更是在公开地希望:那些再被援引过来的旧有段落,一旦被带入到更上一层的构思中,也就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,获得它当初始料未及的额外意义。——而有意思的是,正是在这种“温故而知新”的恒久过程中,思想才能体验到那份峰回路转的惊喜,也才能带着昔年的成果而步入新辟的进境。

说到这里,又需要公正而诚恳地说明,如果再从另一种角度来看,那么,缠绕在自己心中的很多想法,尤其是集中到这里发挥的想法,由于师生之间的长久授受关系,又难免是接着业师李泽厚来讲的,尽管有时候又是以商兑或驳议的形式。——写着写着,我才几乎是如梦方醒地省悟到:在本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话情景,对于我们师生间的微妙关系,竟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呈现:居然一忽儿觉得非常赞同,一忽儿又觉得不敢苟同,一忽儿觉得所见默契,一忽儿又觉得大相径庭,一忽儿觉得惺惺相惜,一忽儿又觉得话不投机……实际上,早在很多年前的一次答问中,我就对自己跟老师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,进行过下面这一番描述了:

其实太像老师了,也有太像的难处!一方面可以说,我在北大等了这么久,就是在等下一个真能像我的,就像李老师当年招到我一样。要是无论才情还是心性,都根

本没有相似之处，这个衣钵怎么传得下去？然而，从我亲身的复杂经历来说，也很容易体会到李老师当时所面对的悖论：像他那样一个性格突出的大才子，如果招不到像自己的学生，不免会自叹知音难寻；可一旦招到了真像自己的学生，他就要面对一个同样喜欢匠心独运的性格，场面自然要生猛火爆起来，此中的五味瓶，岂是外人可以了解的！^①

而眼下，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还要就此再来补充一句：尽管李老师对此未必就喜欢，但至少从身为学生的我看来，只有这种不无纠结的困难关系，才算是非比寻常的依恋形式，——是“思想者学生”对于“思想者老师”的、唯一可能具备起思想家风范的特殊依恋形式。正因为这样，当大家都表现出赞赏或敬畏时，身为学生的我却并不随声附和，倒常去半开玩笑地唱唱反调，因为我觉得只有真刀真枪地讨论，从而真正地进入到他的问题域，才是对这位思想家的真正尊重，同时也有助于保持自家头脑的独立。

然而，当大家多少都有点疏离他时，或者至少当他不再那么如日中天时，反而是你这位学生却依然觉得，他那些深入的辩谈仍言犹在耳，因为当年跟他的那些切磋与比试，已然构成

① 刘东：《理论之上的心智》，《用书铺成的路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1页。

了你心智和生命的一部分。——不待言，这更是因为你已自觉地意识到了，把他大胆挑明的那些学术话题，把他自由发挥出的那些待定假说，去充满激情与想象地发展下去，乃至作为一个思想过站再传递下去，而不是任由似水流年的磨洗，只等婴儿和洗澡水被一起倒掉，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怀想、尊重与报答。

无论如何，尽管眼下从物理的距离来说，自己已跟李老师相隔遥远了，可如果从心理的距离来说，自己却是未曾须臾地离开过他，——至少这本不算起眼的小书，可以算自己心迹的一个明证。

刘 东

2011年8月8日初稿于清华园立斋

2017年1月29日修订于三亚湾双台阁

目 录

自序 / 1

一、 写作的承诺 / 1

二、 无神的事业 / 22

三、 可比的基础 / 45

四、 天边的乌云 / 65

五、 发愤而忘忧 / 90

六、 内在不超越 / 120

七、 从生去看死 / 146

- 八、合一或隔绝 / 168
- 九、何以代宗教 / 188
- 十、儒教的生产 / 221
- 十一、独到的优长 / 250
- 十二、独特的风险 / 289
- 十三、孤独的代价 / 306
- 十四、宗教与理学 / 333
- 十五、启蒙与儒学 / 391

一、 写作的承诺

笔者曾经在不同的场合，多次提到过儒学思想跟存在主义、特别是与无神论存在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关联，以为在那中间隐藏着巨大的精神秘密。——事实上，刚开始敏感到这方面的关联，还是早岁执教于南京大学时的事情，彼时自己刚写完《西方的丑学》那本书，而身边曾经过从甚密的一位同事，又恰是以存在主义、特别是无神论存在主义为研究对象的。由此，究竟如何以直面黑暗的无畏勇气，来重新把人生奠基于清醒的理性之上，从而让认识论与伦理学整合为一，而切除那些并不可靠的虚拟设定，这类意义重大的人生解决方案，就必是自己常常脱口而出的话题。惟其抱憾的是，一直迁延到晚近这段时间，笔者都未能找到合适的时机，来详细阐发这方面的思想，而只是在像下文这样的场合，语焉不详地提到了此一话题：

说到这里,忍不住要再举长期以来围绕儒家的比较研究为例。那么,这种一方面极富文化特性、另一方面又极富思想侧面的思想学说,一旦到了西方思想的参照系下面,会显出怎样的对照效果呢?——事实上,效果还是相仿佛的:它竟然既可以像康德(据牟宗三的研究),又可以像怀特海(据唐君毅的研究),还可以像马克思(据李泽厚的研究),还可以像恩格斯(据张岱年的研究),还可以像马克斯·韦伯(据刘东的研究),还可以像杜威(据郝大维与安乐哲的研究),更可以像海德格尔(据李泽厚的研究),甚至都还可以像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萨特(据刘东尚未发表的研究)……——这还是只从哲学视角来打量呢!若再换上宗教的参照系,那么恐怕整整一部西方思想史,又都会笼罩在孔子的树阴之下,显出跟儒家思想的可比性了。^①

但无论如何,我在上面引述的这篇文章中,也可算是做出了一次公开的许诺,尽管那还只是一项“尚未发表的研究”。而今番自己又来就此发笔,也正是想要向读者们证明,笔者的那次大胆许诺或宣称,并不是一时兴起或者信口开河。事实上,虽然上引这篇文章的主旨,是在说“比较”这种思维方式,常会把人们迷惑得团团转,甚至有可能构成“比较的巫术”,即

^① 刘东:《马戏团的母猴子》,《文景》2010年4月,黑体为这次引用时所加。

把思想给搅混到这样的程度：“任何东西都可以产生出任何东西来”，^①可在另一方面，笔者却一向又都坚持认为，只要能驾轻就熟和运用得当，那么专注于“比较”这种思维方式，就仍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意味深长的、有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启发。——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，笔者才想在这部刚开始动笔的书里，来尝试建立起一种新的“可比性”，以借助于（无神论）存在主义所遭遇的思想困境，来突显滋养了儒学智慧种子的那个初始的思想场域，看看它曾化育过哪些虽属极度重要、却又长期遭到忽视的、最具有中国气派的思想原则或倾向。

还应当平心地及早说明，在我本人的私下记忆中，当李泽厚老师于一九八九年之后着手构思另一份哲学提纲、也即后来被称作《存在论纲要》的那些文献时，他也曾隐约而朦胧地触及过这方面的问题。——比如，让我们读读他后来发表出来的这段话：

在世界而求超世界，在此有限的“活”中而求无限、永恒或不朽；或者，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，去追询“人活着”的（人生）道理、意义或命运；这种哲学或宗教课题，在“后现代”，或只可看作是庸人自扰？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”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，干什么？真实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吗？……中世纪思考和崇

^① 详见本书第九章中的具体论述。

拜上帝；启蒙以来，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。如今，一切均不崇拜、均不思考，只需潇潇洒洒，亦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每个片刻，岂不甚好？游戏人生足矣，又何必他求？用完就甩，活够就死，别无可说，历史终结。生活已成碎片，人已走到尽头，于是只一个“玩”字了得。这个世纪末正偶合“后现代”，不好玩么？^①

有趣的是，李老师在上面的这番随口发挥，尽管被他冠上了“后现代”的名义，却让人难免想起某些故有的古语，比如《列子·杨朱》篇中的下述说法：“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。管夷吾曰：‘肆之而已，勿壅勿阏。’晏平仲曰：‘其目奈何？’夷吾曰：‘恣耳之所欲听，恣目之所欲视，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，恣体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，而不得听，谓之阏聪；目之所欲见者美色，而不得视，谓之阏明；鼻之所欲向者椒兰，而不得嗅，谓之阏颤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，而不得言，谓之阏智；体之所欲安者美厚，而不得行，谓之阏适；意之所欲为者放逸，而不得行，谓之阏性。凡此诸阏，废虐之主。去废虐之主，熙熙然以俟死，一日，一月，一年，十年，吾所谓养。拘此废虐之主，录而不舍，戚戚然以至久生，百年，千年，万年，非吾所谓养。’管夷吾曰：‘吾既告子养生矣，送死

^① 李泽厚：《哲学探寻录》，《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年，第164页。